

金融危机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 中国发展

经济影响、应对思维与发展方式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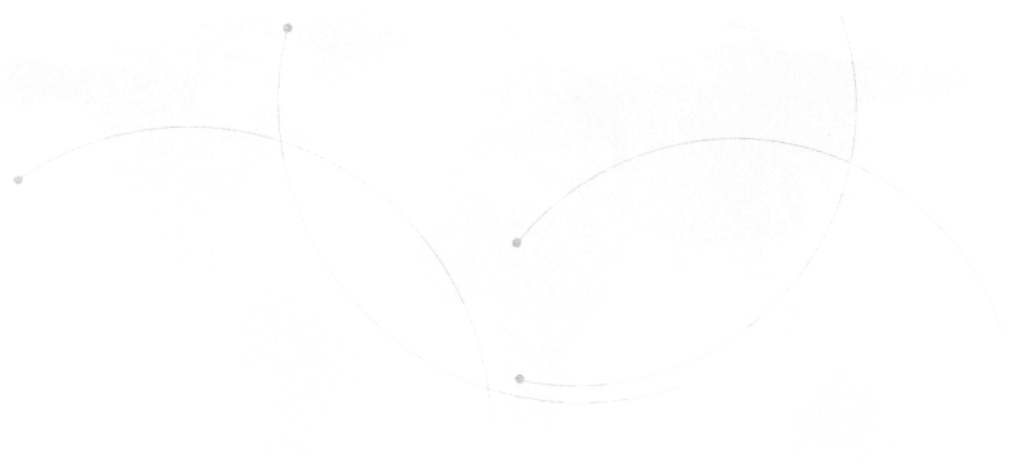
韩光宇 齐红 陈雨露 ◎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保存本
金融危机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 中国发展

经济影响、应对思维与发展方式转型

韩光宇·齐红 陈雨露 ◎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学习、思考与研究、探讨 (代前言)

以脆弱的次级债和滥用的金融衍生品为地基建造的“摩天大楼”终于轰然崩塌，一场被称为“金融风暴”或“金融海啸”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全球经济笼罩在衰退的阴霾当中。“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而中国如何从容应对危机并实现“大治”，则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与实务界面前最为迫切而棘手的问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一个严峻考验。

所谓“辩证”方可“施治”，只有系统探究并深刻揭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找到针对性的施治之法，才能在危机面前化“危”为“机”，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在长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央党校中青一班三支部全体学员将课堂所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以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与富于远见的战略眼光，投入到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对策，特别是中国如何保持无危机增长的研究当中。《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发展：经济影响、应对思维与发展方式转型》的“破茧成蝶”，正是这些充满着青春激情的年轻人群策群力、不懈追求的结果。

本书的编辑出版是贯彻落实中央党校理论联系实际和研究式教学的方针，并将理论研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当中，全面梳理和总结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问题的有益尝试。这是一部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与中国特色的著作。本期学员入学伊始，恰逢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肆虐，入学后不久，中央党校即要求每个学员选择一两个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作为在校学习期间重点研究的课题，从而实现以研究带动学习、以学习促进研究的教学目标。为此，三支部寿梅生书记、陈刚副书记主持支委会讨论决定，每个学员把所研究的问题与撰写毕业

论文相结合,在毕业前夕,将每位学员的研究成果暨毕业论文集结成书。此项工作在韩光宇、齐红老师的指导下,由学习委员陈雨露具体负责完成。根据形势以及教学计划的要求,雨露同志在每个学员自愿申报研究题目的基础上,通过“两下两上”的方式,逐步将大家研究问题的方向和热情聚焦到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模式,特别是中国如何长期保持无危机增长的研究之中并设计出本书的逻辑框架。书稿汇齐后,经过雨露同志夜以继日的统稿和编排,不厌其烦的提炼和修改,最终将35篇精彩的论文熔铸成一部体系完整的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著作,并使得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渗透和散发出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光芒。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发展》是一部凝聚着中青一班三支部集体智慧与情感的著作。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是中央党校最重要的班次之一。中青一班三支部由35位学员组成,来自中央国家机关10人、企业和高校15人、地方及部门10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30人,占总人数的85.7%,其中博研11人、硕研15人、研究生4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26人,占总人数的76.5%,其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学员平均年龄47.5岁,平均工龄26.7年。这些情况表明,本书作者所属系统广泛,对于本地区、本领域的情况十分熟悉,并且具有知识层次高、工作阅历丰富、专业功底扎实和研究问题能力强的特点,这为本书高质量的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书各章以节为序的撰写分工如下:第一章,赵长茂、陈雨露、王晓方;第二章,舒印彪、刘润民、董春波、李晓春、佟吉禄、孙月英、刘跃珍、胥燕婴;第三章,沈立强、寿梅生、蒋伟、孙抱平;第四章,刘金峰、王应际、李国坚、邓秀新、周文斌、陈刚、刘伟平、恽鹏举、齐红、董锦燕;第五章,陈雨露、胡敏谦、杨冠军、宋显珠、邹跃斌;第六章,张勇、李亚飞;第七章,陈雨露、钱巨炎、李守武、任生德、马青山、戴春宁。全书的统稿主要由陈雨露同志负责完成。

本书在编辑出版时力求遵循和体现“三结合”的基本原则: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表现在本书研究的主题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发展》这一主题本身既包含有理论问题,也包含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问题;其次,表现在本书的研究方式上,每个学员在工作多年后又到党校系统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就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冲击和影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撰写出论文再编辑成书,在运用理论总结实践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理论素养。本书研究的方式还表

现为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在一批高水平理论家的指导帮助下研讨问题、著书立说，使实践优势和理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再次，表现在研究的成果上，本书的许多思想观点既是每个学员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结果，也凝聚着许多老师和同学思想智慧的启迪，还包含有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二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所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主要表现为对如何认识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本书既有专门的章节从宏观上进行论证和论述，如导论、第一章和第七章，同时也有专门的章节从微观和中观层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如第二章至第六章。三是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原则。所谓现实与未来相结合，主要是指在研究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冲击的同时，本书也放眼未来，对后危机时期我国的金融开放、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如何实现无金融危机增长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探讨。与此同时，几乎在每个章节都采取阐明问题、分析原因和提出对策建议的方式进行表述。总之，本书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和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的实践价值。

本书包含了在策划、编辑、出版和发行过程中给予我们热情鼓励和无私帮助的领导 and 同志的深情，感谢他们为我们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完稿之际，由于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尚处于进一步深化阶段，我们深感对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发展的解读多有缺憾。当然，解读这样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学界来讲都是一种挑战，本书也仅仅是学员们做出的独有特色的尝试，其中如有错误与纰漏之处，敬请尊敬的读者不吝赐教。

中央党校培训部副局级组织员 韩光宇

中央组织部机关党委（人事局）副巡视员 齐红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陈雨露

2009年7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 1 章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一个概览	8
1.1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并存	8
1.2 长期视角下的危机应对策略：基于扩大内需方针与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宏观经济分析	19
1.3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近期趋势及长期走向	31
第 2 章 金融危机、实体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型： 基于产业调整策略的分析	35
2.1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能源行业	36
2.2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汽车制造行业	49
2.3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电子信息产业	56
2.4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3G 时代的电信业	61
2.5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国际航运业	68
2.6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军工行业	77
2.7 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调整策略：信息化测绘服务业	85
第 3 章 金融危机与金融部门风险： 源自危机敏感性行业的风险因素和控制策略	91
3.1 金融危机下的银行支持体系： 基于房地产行业与中小企业的融资分析	91
3.2 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及趋势分析	104
3.3 金融危机下保险业的风险、监管与竞争力提升	113

第4章 金融危机、民生改善与文化建设：应对新思维	119
4.1 金融危机下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基本养老保障为例	119
4.2 金融危机下的医疗卫生体制：危机冲击与改革思维	132
4.3 金融危机、新农村建设与大学教育： 如何使大学毕业生为农村服务？	142
4.4 金融危机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影响与对策	154
4.5 金融危机下的城乡统筹发展：影响与对策	167
4.6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移民与社会和谐：以水库移民为例	175
4.7 金融危机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思维	183
第5章 金融危机与西部地区的发展：挑战、机遇和开发新战略	193
5.1 金融危机下的西部经济：重要性更加凸显	193
5.2 金融危机下的西部经济：影响与走势分析	194
5.3 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选择： 发挥资源型经济的比较优势	200
5.4 从资源型经济到资源型经济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6
5.5 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之路：发展循环经济	212
第6章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港澳稳定和海峡两岸经济关系	220
6.1 金融危机与香港、澳门经济：影响与对策	220
6.2 金融危机与海峡两岸经济关系：影响、机遇和政策建议	224
第7章 国家控制力与无金融危机增长	233
7.1 金融自由化、国家控制力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 一个新的视角	234
7.2 经济周期与国家干预：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247
7.3 信贷扩张、金融监管与经济稳定增长	253
7.4 国家外汇储备：作为战略工具的超额需求与投资结构调整	256
7.5 金融开放度与国家控制力	260
7.6 国有经济与国家控制力	267
7.7 金融危机、政府工程与国家监管： 免疫和效益视角的政府审计监督	275
7.8 “走出去”战略中的国家利益观	283
参考文献	292

导 论

从 2008 年 9 月开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深化,全球经济都遭到重创。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其经济依然没有起色,而受创者的名单已经越来越长:日本经济大幅跌落,欧洲的困难加剧,新兴国家面临衰退风险。与此同时,汽车业、能源业、电子业等各国经济支柱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震源”的金融业危机仍未见底,坏账和信贷问题不断出现,投资和消费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世界经济 2009 年将面临 60 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已同世界经济形成了难以分割的联系: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7.9%,对外贸易总量已占全球对外贸易总量的 8%;外汇储备从 3 年前起就成为世界第一位,目前已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余额的 28%;中国对外资的利用也长期位列世界前三,部分年份甚至名列第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面临衰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格局还将面临重新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上升。2009 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保 8”成功,那么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 50%,在以 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法独立为经济危机纾困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贡献将在全球经济的恢复过程中举足轻重。

当然,作为一个庞大的外向型经济体,中国不可能在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进出口在2008年已经下降为-0.4,2009年的数字也不容乐观。全国层面的情况尚且如此,地处东南沿海、具有更高外贸依存度的地区就更为困难。在金融危机远未见底、国际市场可能长期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要保持持续的稳定增长面临巨大的挑战。

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也面临长期发展机遇。我们知道,中国要在未来十几年完成经济转型并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任务非常艰巨,而金融危机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首先,在经济高涨时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困难,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三高一低”的企业无力维系而自己倒闭,产业结构因而可以加速实现转型;其次,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是“过热型”增长,必须要忍受石油、铁矿石等各个方面的高成本和通胀压力,而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资源价格下降,有利于中国经济从“过热型”增长转变为更具持续性的“平稳型”增长;最后,中国要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缺的是核心的资源、核心的技术、核心的人才和核心的全球商业网络,而这次金融危机无疑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一些拥有重要技术的国际企业面临严重困难,正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引援和布网的大好时机。

在上述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影响,以此为基础形成有助于克服危机、构筑长期经济增长基础的战略思维,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总体而言,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应对思维与发展转型可以从两个基本的层面加以理解,即金融层面和实体经济层面。

从金融层面上看,无论是当前的危机应对,还是未来的危机防范,中国都应将实现“无金融危机的增长”作为整个金融战略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深刻认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1) 关于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及监管应对策略。应该指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固然有贸易失衡、监管不力、货币政策失当等屡被提及的原因,但根植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内部原因依然未能得到良好阐释。从最近二十多年金融危机的典型事实来看,信贷扩张、资产价格和金融监管的同周期性问题是绝大部分金

融危机背后普遍存在的共同机制。针对我国 2008 年底以来的信贷快速增长,这一机制作为信贷扩张、金融监管和实体经济之间三方联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由于在整个同周期性过程中起核心推动力的是信贷扩张,而基于规则的监管又是失效的,因此未来的稳定框架应该以克服同周期性问题的指向。这一结论的核心要点是:金融监管应该从当前基于单个机构的一般资本监管转向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水平的监管,并结合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工具进行相应的“反周期”操作。具体而言,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组织架构来看,应该有一个与中央银行紧密协作的监管体系,一方面促进金融体系的内部元素在效率稳定性与效率之间维持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机制,实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协调运行。

第二,从监管目标来看,确保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稳定应该成为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而对金融效率的追求应该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第三,从监管方法来看,应对现有的基于规则的监管进行改革,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反周期”的监管方法,可供借鉴的思路包括实施更加灵活的资本要求、建立“反周期”的损失储备基金等。

第四,从政策协调来看,金融监管(包括相应的监测制度)和货币政策必须统筹一致。“反周期”操作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及早采取行动。应通过建立准确、高效、及时的监测制度和预警机制,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主要指标进行监测,以便尽早发现各种典型的不稳定因素,如急剧攀升的资产价格、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明显异常的跨境借贷和资本流动等。

(2) 关于危机视角下的国家金融战略。从长期来看,随着全球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战后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大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以及在全球金融体系重构过程中采取的金融战略,将最终决定“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大国之间金融支配力的新格局。由于金融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基于稳定增长的金融发展战略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协调。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战略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实现产业内部、外部监管和实体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有机联系和互动支持。

第一,在金融业的开放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当前的中国金融改革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点上:全球金融自由化、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对尚处于产业“幼稚”阶段的中国金融业而言,金融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特别地,在国际金融秩序面临重建的背景下,如何通过适度的“开放保护”和国家控制,在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过程中赢得主动,同时又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金融产业的发展需要实现渐进、有层次、有重点的稳步推进,切忌超越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冒进”。就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而言,当前的改革仍然应以金融机构为核心和重点,而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制度建设,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可能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增加额外的不可控风险。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动态角度看,在一个长期的制度均衡中,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应该是相互促进、“螺旋发展”的关系。

第三,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机制来看,以国情为依据夯实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有助于长期的稳定增长。在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禀赋等),并着力于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制度基础建设,使效率机制的传导渠道更为通畅,使多层次的风险控制和稳定性架构更为健全,最终实现效率和稳定性的长期动态平衡。

(3) 关于后危机时期的金融开放发展问题。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但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频率不仅更高,而且存在以下被理论界长期忽略的“非对称性”特征:当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发达国家可能较少受到严重打击;而一旦发达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幸免。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具有被动型特征,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的“自由崇拜”,未能把握好金融开放的度(包括速度和程度),最终导致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弱和缺位。而一旦失去了金融控制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危机遏制能力就会出现急剧下降,此时,伴随自由化进入的外国资本(资金)将取代国内金融资本成为金融不稳定的主导力量,并可能在问题出现时扮演兴风作浪和落井下石的角色。

因此,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具有被动型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将目光从当前的危机解读扩展至更具预见力的危机理论。就当前的情势而言,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肆虐,无论是现阶段的危机控制,还是下一步的危机处置,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以更大的远见来构建更具适用性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防范框架,而这一框架需要纳入金融开放、金融稳定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三方

联动”机制。

应该指出,金融开放从长期来看有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但短期内超越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金融开放极易引发金融危机,这表明对实际金融开放度的把握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金融控制能力的衰微是导致金融危机无法得到及早遏制的重要原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持续开放的进程中,为确保宏观金融风险处于可控状态,我国应该从控制实际金融开放度入手,保持战略上的国家控制力,以实现可持续的无危机增长。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管制防火墙“两难”的情况下,面对过快上升的外汇储备和成本过高的热钱管制,只有合理把握金融开放的度和节奏,增强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和主动性,才有利于金融危机后各种悖论的破解。

如果说实现无金融危机的增长应作为整个金融战略的核心的话,那么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在短期内抵御当前危机的影响,还是在长期中构筑坚实的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中国都应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作为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着力实现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突破:

(1) 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伴随着旺盛的生产和投资需求,大量的“三高一低”型企业进入市场。这些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虽一度带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但同时也造成了环境和生态破坏,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就要摆脱“三高一低”型的产业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产业层次,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水平引进技术和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做法,走高科技、高效益、高附加值和节能环保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产业—投资—人才—效益”的良性循环,实现生产要素从低端向高端转变,推动高级生产要素集聚。基于上述思路,我国下一轮的支撑产业必须是新兴产业和那些非“三高一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即资本、科技密集型企业 and 那些适合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并行发展,既积极地推动产业转型,又发挥比较优势,切实缓解就业压力。

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产业规划还需要加强预见性,不能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在推进农牧区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要注意实现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将有限的生产要素投向有优势、有效益、有潜力的地区和项目,形成集群效应。打破区域分割,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布局,推进工业向基地集中、

企业向园区集中,促进企业集聚发展、集约增长、集成配套。

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产业建设和生态建设并举,促进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要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在对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行业实施技术改造的基础上,开发建设各种循环利用项目,培育出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形成循环产业链条。顺应自然规律,统筹产业发展与改善生态,激活利益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的生态建设格局。

(2) 区域结构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两个基本表现:一是国家宏观层面上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西部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二是区域内部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不断累积。与二元经济的发展相对应,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西部地区最为突出。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因素。

在金融危机和西部大开发进入新阶段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利用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来启动国内需求和实现保增长成为在短期内应对金融危机、在长期内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议题。在东部主要经济圈处于困境、短期内难以维持高增长的背景下,西部经济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与东部沿海相比,西部地区在产业构成、资本形成、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相对较低,因而金融危机对西部的直接影响较小。此外,西部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经济增长尚存在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在当前出口面临紧缩的情况下,西部经济的崛起不仅能填补东部经济增速下降留下的增长空白,还能有效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对抵御危机和保增长均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形势下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从西部地区的客观现实条件出发,以西部自身的比较优势为依托,充分发掘和释放蕴藏在西部经济内的自力更生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依托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建立起新型的资源型经济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扩展为新型的资源型经济圈,不仅是现阶段可行和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而且能为西部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通过合理的政策引领和统筹规划,将西部新型资源型经济圈的建设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确定下来,不仅有助于解决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和个人收入不平衡等诸多难题,还能构筑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未来多边经济合作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来推动西部新型资源型经济圈的建设,需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产业结构的调整可围绕“一体两翼”的基本战略展开;在空间策略上可考虑以“双三角”战略为核心,逐渐形成辐射效应;在发展思路上要变革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出资源滥采、环境污染、发展粗放的恶性循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入关键阶段之际,根据特定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提出了在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意味着科技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

是否成为创新型国家,有一个核心的标志,即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究竟是以劳动和资本贡献为主,还是以科技进步贡献为主。关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符合一个著名的“7—3—3—7 定律”,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70% 靠科技进步驱动,30% 靠新投入的劳动和资本来拉动;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30% 靠科技进步的贡献,70% 靠资本、劳动和原材料的投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尚未转型成为创新型国家,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得不依赖大量的投入,而大量的投入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造成宏观调控难题。因此,对于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而言,要打破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并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型增长,围绕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建设创新型国家意味着不断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这需要经过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是大力提高知识创造的水平,鼓励创新的思维;二是将知识创造转化为专利技术,促进智力生产活动和实际生产活动的对接;三是形成经济增长的共性,真正将科技进步和专利技术转化成现实的经济增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存在比较严重的低效率问题,要在 2020 年建成创新性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任务相当艰巨。

21 世纪头 20 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只有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激发经济活力,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第 1 章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 中国经济：一个概览

1.1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 2008 年 9 月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到全球，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逐渐蔓延深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作为发达国家的欧美各国都难以“富者兼济天下”，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是难以独善其身。对于中国而言，这次危机不仅意味着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长期发展的重大机遇。只有科学分析并把握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顺势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1.1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受金融危机深化的影响，全球经济都遭受重创。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其经济依然没有起色，而受创者名单已经越来越长：日本经济大幅跌落，欧洲的困难加剧，新兴国家面临衰退风险。与此同时，汽车业、能源业、电子业等经济支柱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震源”的金融业危机仍未见底，坏账和信贷问题不断出现，投资和消费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09 年发达经济体将出现 2.0% 的负增长，其中美国为 -1.6%，欧元经济区为 -2.0%，日本为 -2.6%，英国为 -2.8%，低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如表 1—1 所示）。如果中国能

实现 8% 左右的预期增长率, 那么中国对 2009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50%。

表 1—1 发达经济体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情况及预测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世界经济增长	5.2	3.4	0.5
发达经济体	2.7	1.0	-2.0
美国	2.0	1.1	-1.6
欧元区经济体	2.6	1.0	-2.0
德国	2.5	1.3	-2.5
法国	2.2	0.8	-1.9
意大利	1.5	-0.6	-2.1
西班牙	3.7	1.2	-1.7
日本	2.4	-0.3	-2.6
英国	3.0	0.7	-2.8
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货物和服务）增长			
进口	4.5	1.5	-3.1
出口	5.9	3.1	-3.7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国际大背景下, 我国经济 2007 年增长 13% (最终核实数据), 2008 年下降为 9%, 2009 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降为 6.1%。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短期内如此大幅度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 但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对我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冲击。这种直接冲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 出口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2007 年我国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37.5%, 2008 年为 33%, 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料表明, 我国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 对外贸易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的月增长率一直稳定在 20%~30%。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不断蔓延, 导致世界经济放缓, 特别是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美国经济从 2008 年第三季度出现 0.3% 的负增长, 欧元区 15 国和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就已出现 0.2% 和 0.9% 的负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因此遭受严重冲击, 2008 年 11 月进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跌, 从 10 月份的正增长 17.9% 变为负增长 9%, 出口由正增长 19.2% 变为负增长 2.2%。2008 年 12 月到 2009 年 5 月, 我国出口逐月下降, 增长速度分别为 -2.8%、-17.5%、-25.7%、-17.1%、-22.6%、-26.4%。出口急剧萎缩的结果是外贸出口企业经营困难, 甚至倒闭, 失业压力显著增大。据国家统计局分析,

2009年一季度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数。可以确定的是,随着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加深,贸易保护主义势必继续抬头,我国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2) 外汇资产贬值。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所持西方公司的债权、股权的价值随之下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9月末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至2009年3月,我国持有的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国债券达到1.39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由于美国政府大量印制钞票、大量发行国债、把存款利率几乎降到零以及我国机构和企业所持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大幅跳水,我国相关的外汇资产因此遭受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3) 我国股市暴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股市与世界金融市场的关联度不断强化。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震荡不已,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市值大幅缩水。2007年以来,我国股市下跌固然有自身原因,但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是客观事实。可以说,金融危机的加剧,恶化了投资者的预期,给我国股市下跌增添了一个加速度。而股市大幅跳水,不仅因“财富效应”的逆转而影响了居民消费,而且因股市融资功能基本丧失、企业融资受限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4) 外商直接投资减速。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流动性急剧下降,从而迫使西方企业减少对外投资,甚至撤回投资。2008年上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23.88亿美元,较2007年同期增长64.3%,但进入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从10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分别为-2.02%、-36.52%、-5.73%、-32.67%、-15.81%、-9.5%。外商直接投资减速,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弱化。

1.1.2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发展机遇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意味着长期发展的四大机遇:一是通过及时有效的调整确保国民经济的无泡沫化或者微泡沫化,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的无金融危机增长;二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性和可持续性;三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人民币崛起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货币之一;四是此次危机可能成为东西方文明兴衰交替的一个契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非常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重新成为引领全球文明的中心。